

探索刘既漂的设计艺术世界

本报讯 厉亦平 通讯员 高曦 1月4日,“东方斐帝亚:刘既漂设计艺术展”在中国美术学院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开幕。此次展览是为纪念中法建交60周年、装饰艺术运动诞生百年而隆重推出,由中国美术学院主办,中国美术学院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承办,刘既漂家族档案馆、杰奎琳文化艺术、杭州市发展会展业服务中心协办,展览得到了中国美术学院设计学学科建设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作为海内外首个刘既漂个展,此次展览由中法团队联合策划,共展出海内外展品400余件,其中包括许多珍贵的原作,多数展品为首次公开亮相。展览以丰富生动的内容展现了第一代留法中国艺术家中设计和建筑方向的代表、国立艺术院(现中国美术学院)第一任图案系主任刘既漂的设计艺术创作与思想。

刘既漂于1919年赴巴黎学习绘画,1922年进入巴黎高美,后转学建筑。1924年,他在参与创办“霍普斯会”的同时,还创办了首个设计类海外艺术家学会“美术工学社”。1925年巴黎装饰艺术与现代工业博览会上,刘既漂是中国馆的总设计师。1928年,他与林凤眠等共同创建了中国首个国立高等艺术学府“国立艺术院”任图案系(设计学科的前身)主任,并负责罗苑校舍的改造设计。他是近现代博览会之最:1929年西湖博览会的总设计师。刘既漂是中国20世纪初设计、建筑、策展等多个领域的先驱,但由于历史文献的散失,刘既漂这个名字一直被掩藏于历史的烟尘之下。此次展览以刘既漂的艺术生涯为主线,通过六个精心策划的部分,展现了他在多个领域的艺术探索和成就。以



刘既漂 西湖的荷 1975年 刘既漂家族档案馆

刘既漂在法中三次重要的展览会上的创作为节点,描绘了他艺术身份的变化叠加和艺术思想的成长;展览同时呈现了中国现代设计探索与法国现代设计之间的同频共振以及刘既漂的设计思想与中国现代设计主流取向间的异同,显示了其在设计史上的独特位置。

第一部分“志趣转向:巴黎高美的学艺青年”聚焦于

刘既漂在巴黎美术学院的学习经历,聚焦于他从绘画到建筑的兴趣转向,探讨他将美术、建筑与装饰艺术融合于一体的艺术风格是如何形成的;第二部分“大美术观:霍普斯会与美术工学社”通过1924年斯特拉斯堡中国美术展览会,展示了其绘画和设计如何融合东方美学与法国现代艺术,以及他推动纯粹艺术进入日常生活的设计创造;第三部分“‘大同’时代:装饰艺术与现代工业博览会和中国馆”着重展现了他在1925年巴黎世博会以“龙凤朝阳”为母题的中国馆设计,展现了以中国图案为原型融合现代几何形式语言的探索;第四部分“总体艺术:西湖博览会”由刘既漂在西湖博览会中的作品切入,展示了设计从二维拓展到三维,并创造系统视觉设计的新篇章,并且展现了他对现代设计与地方元素融合的深刻理解;第五部分“同道嚶嚶:国立艺术院的设计先声”回顾了刘既漂在国立艺术院的早期设计教育实验,讲述他将设计教育与社会美化相结合的过程历程,以及在图案设计与美术建筑方面的贡献;第六部分“尾声:无尽的乡愁”追溯了刘既漂自1947年远走美国后至去世前的设计及绘画,反映了他对艺术的不懈追求和身在异国对家乡的深切思念。

依托丰富的展品和详实的资料,本次展览不仅是对刘既漂先生艺术生涯的回顾,也是对中国现代艺术与设计发展历程的一次深刻反思,引领广大观众一同走进艺术大师的创作精神和艺术魅力,开启一次中国现代艺术与设计发展的体验之旅。据悉,展览将持续至4月15日。

器物之美
The Beauty of Objects

文人间的博古风尚——说“觚”

■刘静

觚是早期中国出现的一个重要器型,在古代文化和艺术史上的地位不可忽视。《考工记·梓人》道:“梓人为觚,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献以爵而酬以觚。”爵和觚是酒器的基本组合,第一轮敬酒称“献”为爵一升,回敬称“酬”为觚三升。爵是饮酒器,觚除了饮酒功能外可能还兼具温酒、灌酒的多重功能。

觚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期,以陶觚为主。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制作精美的陶觚,红陶、灰陶、彩陶都有出现。良渚文化遗址则出土了漆觚,用整块木头凿制而成木胎,表面髹朱漆。此时觚的造型已与商周时期的青铜觚十分相似。

觚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早期,最具代表的是青铜觚,功能为礼器和酒器,在祭祀、宴饮等场合中使用。器型特点为喇叭形口、喇叭形底、束腰,常见饕餮纹、联珠纹、弦纹、蕉叶纹等浮雕图案装饰。到了殷商后期,觚口大外张,不再适宜饮酒,转为专属礼器。觚在西周渐衰,至西周中期后极为罕见。春秋时期的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感叹:“觚不觚,觚哉!觚哉!”即是借觚的变革来表达对社会“礼崩乐坏”的叹惋。

宋代金石之学盛行,觚之名实即确立自宋人。宋代吕大临在《考古图》中正式将其定名为觚。在宋代尚古风潮的影响下,觚得以复兴。因夏商周三代古器物稀有难得,宋代大量仿制铜觚。宋代制瓷业发达,五大名窑确立,开始仿青铜觚而制作瓷质觚。仿铜式觚、贯耳式觚、海棠式觚等创新觚造型也相继出现,逐渐脱离青铜器觚而成为独立的瓷器品类。随着宋代文人的美学影响日益深入,觚已逐渐转变为陈设观赏器和日用花器,进入生活场景。出土于杭州老虎洞窑址的南宋修内司官窑花觚,高21.5厘米、口径13.7厘米、足径8.0厘米,敞口、长颈、束腰、圈足,造型清秀,釉色粉青,玉质开片,是一件典型的南宋官窑瓷觚。南宋陈清波的画作《瑶台步月图》中,几案上置花觚插一枝金桂,渲染了仕女秋季赏月的风雅之景。时人喜用铜觚插花,除了金石风尚、美学观念影响外,还因古铜器适宜养花。南宋赵希鹄《洞天清录》中记载:“古铜器入土年久,受土气深,以之养花,花色鲜明如枝头,开速而谢迟,或谢



清乾隆粉彩缠枝八宝纹花觚

则就瓶结实。”铜器储水释放铜元素,增强花卉的生长发育。同时,古铜器表面生成的铜绿具有杀虫、杀菌和防腐作用,能够延长花卉的保鲜期,使瓶中之水不易变质。

明代延续了宋人的尚古之风,觚也被文人雅士们所追捧,称其为“花觚”“美人觚”,用以陈设、插花、清供。明代张岱《陶庵梦忆》中载:“河南为铜数,所得铜器盈数车,美人觚一种,大小十五六枚。”“美人觚”特指细腰撇口、形态纤美的觚,反映了时人对觚的审美趣味。明代鉴藏家张德谦在《瓶花谱》品瓶一节中论:“铜器之可用插花者,曰尊,曰罍,曰觚,曰壶,古人原用贮酒,今取以插花,极似合宜。”概括了觚功能的时代转变以及文人间的博古风尚。明代文人袁宏道在《瓶史》器具一节中道:“尝见江南人家所藏旧觚,青翠入骨,砂斑垓起,可谓花之金屋。”袁宏道将旧觚定位为“花之金屋”,功能上以插花为用,地位上评为花器之至高格调,可见觚在明代所受到的追捧。明四家之一的仇英在《汉宫春晓》图中,绘制了四件青铜觚,作为陈设摆件来装饰空间,华丽雅致,同样反映了明

代鉴古风气以及对觚的玩赏偏爱。在其《人物故事图册·竹院品古图》中,描绘了时人鉴古的场景,其中两件青铜觚,为商代风格,装饰厚重。其中一件觚中插朱红色珊瑚,华丽庄严。明代画家陈洪授以高古奇骏的人物画著称,在绘画中常绘器物花卉来隐喻人物敦古好雅的品格,寄意言志。觚便时常出现于其画面中。《玩菊图》中绘陶渊明赏菊,简约造型的素色瓷觚中插一枝寒菊搭配寥寥红叶,寓意其清淡无为的隐逸思想。《痛饮读骚图》中绘一敞口撇足、造型夸张、砂斑垓起的青翠铜觚,插一枝桠曲折的白梅配竹叶一簇,格调高雅旷古。

清代,觚的器型品类变化多样,釉彩工艺更加丰富,成为一款普及性的陈设器物 and 插花器皿。清代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写道:“花觚:口大腹小者,谓之花觚。明制者身段直下,绝无波折;康熙以后,则腰际凸起,略如香案中插花之具矣。康仿明制,粗五彩花者为多,于粗率中更见老横。至乾、嘉,则有镂金错采、锦堆成片者。有一种口绝侈而身甚瘦,直下无曲折,而身际盘有凸螭一条者,系素三彩,乾、嘉均有之,仿制者尤多。”现存清康熙青花缠枝纹花觚,腰线更加平直,缠枝纹满铺,是清代典型风格的花觚类型之一。清乾隆时期一件五彩花觚,造型中部隆起加大,纹饰繁复,釉色明艳,如佳人亭亭,再添秀气。掐丝珐琅、琉璃、粉彩等多种工艺制作的花觚均有出现。清代清供主题绘画流行,存世大量作品,画中常以觚入画,花觚此时已逐渐融入世俗文化。

觚流传到日本,成为日本流行的花器,对日本铜器和瓷器的器型以及日本花道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延续四百年的日本高冈铜器制作的铜觚畅销至今。花觚受到各大日本花道流派以及茶道流派插花的喜爱,尤其是文人风格的插花,常选用觚作为花器来制作。

觚作为典型特色的传统器型,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兼具“礼”与“用”,至今被广泛传承与创新应用,已然成为代表中国的精神和文化符号。第十九届杭州亚运会的颁奖花束创新使用了花器,其造型即源于南宋官窑花觚,以东阳木雕制作而成,造型简洁,线条流畅,展现了杭州新时代创新精神及温润厚重的文化底蕴。